

# 早期革命文献的揭示、解读和研究

——以李季致蔡元培、胡适的 17 通书信为例<sup>\*</sup>

□ 张红扬

**摘要** 随着对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和民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民国文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革命文献越来越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文章以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之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家李季在 1920 年到 1923 年之间致蔡元培、胡适的书信 17 通为例，从特藏文献的发掘和揭示的角度出发，全面分析和研究其内容，展示了特藏文献研究的全过程。作者提取并展现了书信中隐含的大量具有研究价值的重要信息，其中尤以蔡元培和胡适对李季的马克思主义著译的指导和帮助为重点。

**关键词** 革命文献 李季 蔡元培 胡适 马克思主义著译

**分类号** G256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16.06.017

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对中国共产党党史和民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民国文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革命文献越来越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早期革命文献一般是指，晚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 1949 年左右，其间产生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及中国革命的发生和发展的相关文献。

笔者在研读早期革命文献的过程中注意到，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之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家李季在 1920 年到 1923 年之间曾致蔡元培、胡适书信 17 通。这批文献不仅是党史文献，也是北京大学校史文献，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笔者意欲从特藏文献发掘和揭示的角度出发，并结合人文及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从时代背景、李季经历、书信内容、重要性及意义等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展示特藏文献细颗粒度发掘和研究的全过程。

李季(1892—1967)，湖南平江县人，又名原博、卓之，字懋猷，号协梦、移山郎。1915 年入北京大学英文门，1918 年毕业。五四运动中受到新思潮的影

响，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 年参与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 15 名成员之一。1921 年赴法国寻求留学机会，1922 年辗转到德国，入法兰克福大学经济系，1924 年转入苏联东方大学。1925 年归国任上海大学经济系教授、社会学系主任。1927 年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社会学教授。同年回平江，次年定居上海，以著译为生。1929 年加入托派，次年退出，重新以笔耕为业。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出版总署特约翻译，1950 年在《人民日报》同刘仁静一起发表声明，表示对既往参加托派的历史的忏悔。1967 年 2 月在上海去世。

李季在 40 余年的著译生涯中，著有《马克思传》、《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辩证法还是实验主义》、《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我的生平》等书籍，译有《社会主义史》、《通俗资本论》、《价值价格及利润》、《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4 卷)等，全部著译文字在 600 万字以上，著作甚丰，尤以马克思主义译著闻名。他翻译的《社会主义史》，蔡元培特为作序，被“上海各学校并选为国文读本”<sup>[1]</sup>，此书还是使青年毛泽东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三本书之一<sup>[2]</sup>。

由于李季的托派经历，以往的意识形态话语系

\* 北京大学党建研究会 2014—2015 年度课题研究成果，课题编号：20150212。

通讯作者：张红扬，ORCID：0000-0002-1434-7326，zhanghy@lib.pku.edu.cn。

统内的研究,基本上将他排除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谱系之外,对其译著的研究甚少<sup>[3]</sup>。近年来,一些研究者转换思路及研究方法,对李季的研究已经拓荒并有一定成就。例如:吴海勇的《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李季翻译经历考述》,以李季《我的生平》为经,纬之以李季与蔡元培、胡适的通信等晚近史料,考述李季从五四运动起到1921年党的一大召开前夕,所进行的海外社会主义思潮译介工作<sup>[4]</sup>。汤艳萍的《马克思主义史家李季初探》,从李季译著对马克思主义的引进着手,多维度地梳理其学术脉络,重新将他纳入马克思主义史学谱系<sup>[5]</sup>。刘霞的《对李季所著中国首部长篇〈马克思传〉的研究》,充分肯定了李季在20世纪20年代撰写的《马克思传》。这部传记约70万字,是当时篇幅最长、内容最丰富、论述最全面的一部白话文的马克思生平传记<sup>[6]</sup>。在这些新近的研究中,笔者注意到,研究者援引的史实和文献,尤其是关于他的马克思主义译著经历和过程的,大多来自李季和蔡元培、胡适二位的通信以及他的自传《我的生平》。关于后者,据李季自己叙述,原本打算“作成一本几万字的‘虚虚实实实虚虚’的写实小说”<sup>[7]</sup>,且其中人物,均隐去真实姓名而用西文字母代替,如非有严密的考证,作为史实来应用是缺乏可靠性的。因此,虽然研究者们多利用李季和蔡元培、胡适的17封通信作为第一手资料来说明各自的观点并形成结论,但是对于这17通信本身却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这17通信件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为何李季要与蔡元培、胡适通信?通信的历史背景是什么?这些通信与李季当时所从事的马克思主义著译是何种关系?这是我们进行特藏揭示和研究所必须回答的问题。

## 1 通信时间、时代背景及李季经历

17通信件写于1920年3月1日到1923年2月20日。与胡适的12通,与蔡元培的3通,同时写给蔡元培、胡适的2通。其时五四运动虽落下帷幕,但整个通信时段与新文化运动的时间基本重合。其间中国共产党走过创党的准备期,在嘉兴南湖的船上宣告成立,步入了建党初期。李季1918年后曾在北京大学预科担任英文教员和文化教员,因英语口语不佳被迫辞职。后为解决生活问题,曾去山东一家煤矿做英文秘书,又曾跟随陈独秀去广东寻找发展机会未果,于是心生赴欧留学之意。与蔡元培、胡适

通信期间是李季著译创造力勃发的阶段,他著译40载,共约完成31部(篇)译作,在与蔡元培、胡适通信的三年间,就完成了其中的13部(篇),译著包括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罗素的《到自由之路》(与沈雁冰、黄凌霜合译)、Idarley的《工团主义》、列德莱的《社会主义思潮及运动》、托尔斯泰的《现代的奴隶制》、马克思的《价值价格及利润》、威尔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原理》、普奈西的《不要调和》、马克思的《通俗资本论》,论著有《马克思传》和《社会主义与中国》等。在与蔡元培、胡适的通信中,这13种著译均被提及甚至作详细论述。

17通信件书写的具体时间和收信人见表1。

表1 李季17通信件书写的具体时间和收信人

编号	信件日期	收信人
1	1920.3.1	胡适
2	1920.6.27	胡适
3	1920.9.1	胡适
4	1920.10.3	胡适
5	1921.6.2	胡适
6	1921.7.11	胡适
7	1921.8.21	胡适
8	1921.9.11	胡适
9	1921.10.5	致胡适
10	1921.10.23	胡适
11	1922.2.14	胡适
12	1922.5.2	蔡元培、胡适
13	1922.6.12	胡适
14	1923.2.20	蔡元培、胡适
15	1922.7.15	蔡元培
16	1921.8.21	蔡元培
17	1921.10.23	蔡元培

## 2 李季与蔡元培、胡适通信的主要内容

### 2.1 关于马克思主义著译的问学

李季与蔡元培、胡适通信中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内容是关于马克思主义著译的问学。此处“问学”一词是指求教、请益之意。通信中主要问学的著译及内容如下。

#### 2.1.1 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的翻译

李季所译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是其成名之作,也是其影响最大的译著。李季曾就该书的审校



和翻译细节请教胡适。在 1920 年 3 月 1 日的信中，告知已将《社会主义史》第一章译出，请胡适“将译稿看一遍”，并“请将不对的地方代为修改一番”<sup>[8]</sup>。同时，请教专有名词的翻译问题。如“社会主义学说”一词，因在英文中有 the theory of socialism 和 the socialistic theory 两种表达，请问胡适究竟应当如何翻译<sup>[9]</sup>。还有，“英文中的书名有时加上的 quotation marks，在中文中如何表达，是用引号还是用直线？”<sup>[10]</sup>。随后，在 1920 年 9 月 1 日给胡适的信中告知，“上学期所译之‘社史’，经生两次修改，已将一切错误，及不妥当之译音译名等除去了。予民先生曾亲看一遍，并赐长序一篇，（见八月廿一日晨报第二张）。生本想请夫子作序一篇，因夫子远在南京，故不能为愿。”<sup>[11]</sup>

### 2.1.2 列德莱的《社会主义思潮及运动》的翻译

关于列德莱的《社会主义思潮及运动》的翻译，李季就翻译的缘由、书名及专有名词的翻译、小数点的翻译表达法、自序的审定、请求作序等致信胡适。在 1920 年 9 月 1 日的信中，告知该书是张申府交待他翻译的，他自己对于该书的看法是，“此书前半部多理论，缺乏统系，后半部记 1914 后各国社会党派的行动，较前半部为佳。克卡朴的社史至 1913 年为止，此书记 1914 年以后的事，可与克氏书相衔接，故生想将他翻译出。”“但名称尚不易定，仍请夫子代译。”另外还有一专有名词，“guild socialism 之 guild 这个词应为何译？请一并示之”<sup>[12]</sup>。在 1921 年致胡适的信中，请求道：“列德业的事略，做了一篇序言，今特抄好寄上，内中若有不妥的地方，务请你代为改正，刊在译稿前面。又附上列氏的相片一张，请登在社会主义思潮及运动的卷首。”<sup>[13]</sup>在 1921 年 9 月 11 日的信中，又告知胡适：“我从前译书时，遇着了百分法的数目如 36.4% 之类，按照一位留美学生的说法，一直译成百分之三十六又十分之四。当时没有细想，即照他的话写下来。现在实地计算起来，才知道这话确是错了，上式译成中国话，应为百分之三十六又千分之四，但念起来实不便当，仍应照算学原式译为百分之三十六. 四或百分之三十六，小数点四。余此可以类推。先生接此信后，请即转告校译稿的各位先生遇见此等错误务必随时改正”<sup>[14]</sup>。

在上通致胡适的信中，同时附一不封口的信给蔡元培，主要请求事项是求蔡先生为该书作序，“生此次所译的《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一书既可为前

书（即《社会主义史》，本文作者注）的续本（此书较社史更平允），务请先生将译稿（译稿在何处询适之先生）翻阅一遍，再赐一序，（生此次在船中，自作一序寄与适之先生，内中有列德莱的小传，先生阅读稿可一并阅之。）至其余四种译稿，先生如有暇，各赐一序，至所盼祷，但如事忙不暇，及此，生万不敢强求；不过《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的序务望俯允所请。”<sup>[15]</sup>

### 2.1.3 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翻译

在 1922 年 2 月 14 日致胡适的信中，李季就《资本论》的翻译版本的选择及翻译计划向其汇报，并请胡适为其留意，如国内已有人翻译了请通知他以免重复翻译。李季先是“将英文《资本论》与德文《资本论》对看”，“英文《资本论》所分的句段与原文不相符，并且有许多不对的地方。德文《资本论》亦有两种，一种是昂格思(Engels)所订正的，一种是考茨基所订正的（1914 年），我将两种比较一下，觉得后一种最好（英文《资本论》是依据德文《资本论》第三版翻译的，但现在所流行的德文《资本论》都是第九版的订正本，这是指前一种），因为考氏将（一）《资本论》中的外国名词核加以德文的注释，并将书中所引的法文、拉丁文等全部译成德文，（二）将内中的错误颠倒之处加以改正，（三）加入许多注释，（四）将书中所引的人名加上数语，叙出他们的生存时代及职业。可惜考氏所手订的资本论只有第一卷（他因应社会民主党请求，特订正此书，以便德国工人购读），并没有第二、三两卷。我来德的最大目的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已购得马昂两氏的著作及他人对于马氏的评论等著作七十余种，计九十多本，行将加以缜密的研究，并拟于今年五六月时间始翻译《资本论》（真不容易翻译，我想国内必没有人着手译此书，但先生如有所闻，务希随时示知以免我白费劳力。”<sup>[16]</sup>1922 年 5 月 2 日致蔡元培、胡适的信中又一次提到将于课余开始翻译《资本论》<sup>[17]</sup>。

### 2.1.4 著《马克思传》

以译著见长且首译成名的李季，1922 年 7 月 15 日给蔡元培的信中最早披露要著一部大书<sup>[18]</sup>。在 1923 年 2 月 20 日的一通长达 8 千余字的信中，向两位亦师亦友的尊长详尽严密、淋漓酣畅地介绍了写作《马克思传》的状况。该信仿佛一篇论文，有观点、有论述、有结论<sup>[19]</sup>。

信中首先说明了由译转著的原因，一是有大量



的理论书籍可以阅读；二是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大学有无数的名师可以担任导师，优越的学术环境可以使学问精进。来德的主要目的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到德后陆续购得马克思主义著作一百余种，通读了一遍后，感到要从马克思传记入手来进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李季并引用适之先生语：“自古成功在尝试”，认为自己“也不能不尝试尝试。”<sup>[20]</sup>李季比较了当时较为著名的两种传记，美国斯巴哥(J. Spargo)的《马克思传及其著作》(Karl Marx, His Life and Works)和莫尔林(Mehring)的《马克思》(Karl Marx)。李季认为斯巴哥的书不能称为《马克思传及其著作》，因为对其重要著作《资本论》涉及甚少，论述无物，且错误较多，材料缺乏裁剪，不甚有价值。相较而言，墨尔林的《马克思传》却是杰作。但杰作也有问题，它只注重当时的政局，忽略了马氏的学术。两书共同的缺点是，生平重要事实有缺失，且从作者各自的国度的角度出发，对中国问题一字未提<sup>[21]</sup>。

李季将自己的著作命名为《马克思传及其学说》，拟分上下两卷，两卷计划在30万字以上。实际后来出版的《马克思传》仅上卷(共3册)就70万字。李季计划按照马克思的生平，将全书分为四章：少年时代(学业时期，1818—1843)、壮年时代(奔走时期，1843—1849)、中年时代(修养时期，1849—1867)、晚年时代(成名时期，1867—1883)。并将同一性质和同一种类的事集中呈现，避免像上述两书那样，散见于全书各处，使读者不能一目了然。在取材上，第三章的第七节“研究室中的成绩”决意要突出马克思在学术理论上的奋斗历程；第二节“文字生涯”中，突出马克思叙述中国问题的五、六千字；第四节之所以加了“拉塞尔”(国家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唯心主义者)一段，原因在于，拉塞尔的理论与马克思的学说是对立面，介绍他有比较鉴别之意义，有助于更深刻地领会马克思主义，因此不是蛇足。此外，对于马克思的性情习惯也尽情描写，以使传记栩栩如生。李季特别告慰两位师长，该书全部为自己的研究成果，“除引用的资料外，内中没有一小节是从斯、墨两氏的书上或任何书上抄的。这是生可以问心无愧”。李季并“特将第二章《共产党的起源》末尾数节，第三章《共产党的崛起》中间数节和《研究室中的成绩》起头数节，另纸抄呈，请求指教。待全书告成时，当即呈上，请各赐一序。”最终，蔡元培为其做序<sup>[22]</sup>。

### 2.1.5 通信中提及的其他著译

李季与蔡元培、胡适的通信中，除了较为详细地请教上述4部著译外，还提及下面6部译著以及2篇文章。在1921年8月21日致蔡元培的信中告知：“今上年发奋译书，计共译出名著五种。1. 美国列德莱博士《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2. 美国威尔《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原理》；3. 德国马克思的《价值、价格及利润》；4. 德国里普奈西德《不要调和》；5. 俄国托尔斯泰《现代的奴隶制》；约50万言。”<sup>[23]</sup>在1920年10月3日给胡适的信中提及，“近来正译 Harley's Syndicalism，大约月底可以告竣。生近日译书颇少困难之处，亦不复拘泥字面；然仍得夫子从前指导之力，决无此等进步。”<sup>[24]</sup>另外还有两篇文章，在1922年7月15日给蔡元培的信中提及，是其替《新青年》所作《马克思主义研究发端》及《爱国主义与中国学生》<sup>[25]</sup>。

### 2.2 关于学习及生活的情况汇报以及出版、稿费及经济援助要求

李季在信中多次向蔡元培、胡适两位师长汇报其在国内所到之处以及在法国、德国的生活、学习状况。总的来说，学习和著译情况尚好，但经济情况一直捉襟见肘，因此多次在信中请求蔡元培、胡适二先生出手相助。例如在上述1921年8月21日致蔡元培的信中所提及的五部译著均由胡适帮助介绍，售于世界丛书社。李季由法赴英，即以此译著稿费为留学费用<sup>[26]</sup>。此外，译稿的转交、出版、稿费领取等琐事也交给胡适办理。1921年6月2日的信中，李季将自己所译的《工团主义》和《价值、价格及利润》两书的译稿寄给胡适转交商务印书馆陶孟和。“你接到我的译稿后，请即写一信通知我。”“英文毕业证书如尚未办好，请代为一催。”<sup>[27]</sup>在1922年7月15日给蔡元培的长信中诉说道，因马克跌价，购进待升值，结果继续下跌以致损失惨重。加之购买了八百多部书，手头马克将尽，委托先生询问胡适，一是催商务的译稿费，二是请胡适先生转告出版社，希望每千字增加一元稿费，并请换成英镑寄来，“若再延迟，真不知死所了。”<sup>[28]</sup>在1923年2月20日给蔡元培、胡适的信中说：“数日前接到适之先生嘱商务印书馆所汇英镑50镑，虽好像大旱中的甘霖，”但还了各种帐后，“余数只能勉强支持三四个月，望子民先生于接到此信后，即为生汇英镑五十镑来德，使生得专心求学，兼得把《马克思传及其学说》下卷著成。”<sup>[29]</sup>



李季在与蔡元培、胡适两人的 17 通信件中,一再表露出他研究和著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雄心与他的经济困窘的现实的矛盾。求助于蔡元培、胡适两位师长,是为了解决衣食住行,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正如他在 1921 年 7 月 11 日写给胡适的信中所说:“我是愿意往前极力奋斗的,但我希望你帮助我奋斗,庶几我可减少许多痛苦!”<sup>[30]</sup>

### 3 李季与蔡元培、胡适关于马克思主义著译的通信意义及重要性

通过对以上 17 通书信内容的分析可见,李季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有相当深度和广度,体现了早期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弥补了建党前后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不足。李季向蔡元培、胡适两位的求教和请益不仅使李季个人获益非浅,而且客观上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

#### 3.1 李季问学的进益

由于目前披露的 17 通书信只是李季方面的去信,尚未见蔡元培、胡适的回信,是否李季的每一求助都得到落实,无法一一考证,但从李季的日期较后的信中以及著译的出版序言中可以看出蔡元培、胡适给他的丰厚教益和帮助。

蔡元培作为其时的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京大学,开“学术”与“自由”之风,在全国知识界拥有至高的声誉和地位。蔡元培应允李季,为《社会主义史》和《马克思传》两书作序,实际上给李季的译作作了最好的“营销”和“宣传”。首部译作《社会主义史》的成功,除了李季本人的努力外,与蔡元培的提携也不无关系。李季在 1921 年 8 月 21 日给蔡元培的信中说道:“生前次所译的《社会主义史》承先生赐序,将其中优劣之处一一道破,读者称道不衰,上海各学校并选为国文读本;”<sup>[31]</sup>《社会主义史》译者序中,李季特别交待译书过程中“蒙蔡子民先生代译好些德法文书报名,胡适之先生指示疑难之处,张申府先生改正各专名词的译音”<sup>[32]</sup>。1929 年,蔡元培为李季所著的《马克思传》封面题字,并撰写序文:“今人以反对中国共产党之故,而不敢言苏俄,不敢言列宁。驯致不敢言马克思,此误会也。吾人研究中国共产党所由来,或不能不追溯马克思;而研究马克思,不必即与中国共产党发生关系。且研究与盲从不同。研究马克思,不必即信仰马克思。孙先生于民生主义

讲演中,承认马克思为科学的社会主义者,而亦历举其误点,是研究之结果也。现今各国反对共产党,敌视苏俄者甚多,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则无不有译本。我国马克思学说之译本,亦渐渐出版矣,应论世之人之需要,于是马克思传亦为当务之急。李季君前在德国,专研马克思;所草马克思传,汇前人所作,而辨其异同,正其讹,庶有以见马克思之真相。于出版之期,辄题数语,为之介绍。”<sup>[33]</sup>

李季给胡适的信中均称“适之夫子”,落款均署受业李季。胡适仅年长李季一岁,而生平遭际十分不同。1917 年 26 岁的胡适已是北京大学教授,1922 年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代理文科学长。1932 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早早暴得大名。对于胡适,李季既执弟子之礼,同时书信行文中有时也不拘小节,表现出亦师亦友的关系,有尊敬,也有老友和同龄人间的随意和率真。如在 1921 年 7 月 11 日的信中,就一些事务性工作求其帮忙:“你接到此信后,望你特别通融,即予我一封认可的回信(望用快信)。至于致上海商务馆领钱的凭据,请你从信中寄给我,否则迳寄上海。我现在家内静候你的快信,你的信一到,我即起(应为启)程赴沪。”<sup>[34]</sup>1920 年 10 月 3 日的信中,对病中的胡适表达了非常的关切,并详尽地将自己养病的经验告诉胡适。<sup>[35]</sup>

关于胡适和李季的关系,不能不提及的是李季针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所著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胡适晚年曾和唐德刚提到:“批评我的书,李季写的还比较好。”<sup>[36]</sup>顾冠群说:“用唯物辩证法去研究国学,李季先生虽没有成功,但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胆尝试。”<sup>[37]</sup>李季对胡适的批评实在是由于道不同、信仰不同以及治学方法的不同,并非个人恩怨一语可蔽之。

李季能够在马克思主义著译方面取得成就,他的天赋、才华以及刻苦勤奋是基础,蔡元培和胡适在其中的作用也不可小觑。他们在李季国外求学、著述、学术成果出版的整个学术过程中给其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持和物质支持,从 17 通信件中我们可见师生互动、灵感激发、感情交流、问学解惑、学术支持、经济援助,以及李季在法国、德国留学期间经济状况不佳时的情绪宣泄和精神需求。因此,蔡胡两人不仅起着传道、授业、解惑的作用,而且是李季的精神及经济后盾。



### 3.2 蔡元培、胡适对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贡献

蔡元培、胡适等人营造的兼容并包的学术氛围，为新思潮、新思想在北京大学及当时的知识界的传播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客观上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的强大影响力和感召力激励着无数有志青年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将研究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人生目标的李季，就是其中较为杰出的一位。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有明确的既定目标，并且直到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地德国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李季可谓凤毛麟角。李季与蔡胡两位师长的17通书信表明，他是目前发现的在马克思主义著译中得到蔡元培、胡适教益较多的一位。与蔡元培、胡适通信的三年中，李季的个人著译取得了丰硕成果，达到了个人创造力的高峰。

### 4 结语

通过对李季致蔡元培、胡适17通书信的深入分析和研究，我们发现，文献的细颗粒度发掘和深度揭示对于李季研究有着积极的拓展作用。以往的研究者们认为，在苏联十月革命及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及成立初期，李季翻译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弥补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理论上的不足，对马克思主义的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上述的文献分析，我们发现，在李季的贡献之中，也凝结了蔡元培、胡适对于李季马克思主义理论著译的指导、建议和帮助的信息将给予研究者新的启示。

胡适先生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研究工作的推进需要寻求证据，而证据往往发现和形成于文献的详尽研读和深度分析中。

### 参考文献

- 1 李季. 李季致蔡元培信三通. 见: 耿云志.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8卷)[M]. 合肥: 黄山书社, 1994: 96.
- 2 斯诺. 西行漫记[M]. 上海: 东方出版社, 2005: 147.
- 3 汤艳萍. 马克思主义史家李季初探[硕士论文]. 济南: 山东大学, 2012: 1.
- 4 吴海勇.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李季翻译经历考述[J]. 上海党史与党建, 2010(11): 14—16.
- 5 同 3: 1.
- 6 刘霞. 对李季所著中国首部长篇《马克思传》的研究[J]. 河南社会科学, 2014, 22(1): 57—62.
- 7 李季. 我的生平[M]. 上海: 亚东图书馆, 1932: 序言, 1.
- 8 杜春和. 韩荣芳. 耿来金. 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 558
- 9 同 8: 558.
- 10 同 8: 559.
- 11 李季. 李季信十四通. 见: 耿云志.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8卷)[M]. 合肥: 黄山书社, 1994: 53—55.
- 12 同 11: 54—55.
- 13 同 11: 69.
- 14 同 11: 70.
- 15 同 1: 96—97.
- 16 同 11: 76—77.
- 17 同 11: 79.
- 18 同 1: 93.
- 19 同 8: 560—572.
- 20 同 8: 570.
- 21 同 8: 566—567.
- 22 同 8: 567—568.
- 23 同 1: 95—96.
- 24 同 11: 56—61.
- 25 同 1: 93.
- 26 同 11: 95.
- 27 同 11: 66.
- 28 同 1: 92.
- 29 同 8: 571.
- 30 同 11: 68.
- 31 同 1: 96.
- 32 克卡朴. 社会主义史[M]. 李季, 译. 上海: 新青年社, 1930: 译者序言.
- 33 李季. 马克思传[M]. 上海: 平凡书局. 1929; 蔡元培序.
- 34 同 11: 68.
- 35 同 11: 56—61.
- 36 胡适. 胡适杂忆[M]. 见: 唐德刚. 传记文学丛刊之四十七. 台北: 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1: 117—118.
- 37 顾冠群.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J]. 中国新书月报, 1932(4—5): 5—6.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图书馆, 北京, 100871

收稿日期: 2016年4月26日

## Inquires and Discussions about the Translation of the Marxist Works in Li Ji's 17 Letters to Cai Yuanpei and Hu Shi

Zhang Hongyang

**Abstract:** Li Ji, a member of the Shanghai Preparation Grou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a famous translator of the Marxist works, wrote 17 letters between 1920—1923 to Cai Yuanpei and Hu Shi for advice about his translation of the Marxist works. A study of these letters reveals the efforts and insights of Cai Yuanpei and Hu Shi in Li Ji's translations.

**Keywords:**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s; Li Ji; Cai Yuanpei; Hu Shi; Marxist Works Translation